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传统史学与20世纪史学

谢保成◎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传统史学与20世纪史学

谢保成◎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史学与 20 世纪史学 / 谢保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61 - 8057 - 0

I. ①传… II. ①谢…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437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0
插 页 2
字 数 393 千字
定 价 10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关于中国史学的基本认识	(1)
一 历史·史学·史学史	(1)
二 如何认识中国史学	(7)
神话传说与历史意识	(37)
一 中国神话传说的基本特征及演变趋势	(37)
二 神话传说中的“史影”	(42)
三 神话传说的政治化、历史化	(48)
殷周之“史”由不“记事”到史书编纂	(58)
一 “史”不从“中正”之“中”	(59)
二 殷商之“史”非“记事者也”	(60)
三 西周之“史”名目繁多,均非专职“记言” “记事”官	(66)
四 东周之“史”,始指史官、史书	(75)
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	(87)
从司马迁、班固关于汉高祖的两则史论看《史记》《汉书》 之际的思想变异 ——兼谈史学史研究的某些缺失	(109)

一 问题	(109)
二 董仲舒的“尊儒术”“推阴阳”,预示了汉代思想的基本特点	(111)
三 儒学成为“禄利之路”,由“支叶蕃滋”演变为“分争王庭”	(112)
四 灾异说弥漫朝野,变换着“德”“统”观念	(119)
五 刘氏父子的成就及影响	(127)
六 余论	(138)
经学的统一与变异	(143)
一 经学的统一与“惑经”的出现	(143)
二 社会变动引出的“思想危机”	(150)
三 《春秋》新学的兴起	(155)
四 新经学的影响与地位	(168)
五 几点结论	(173)
唐人别集中“文之将史”的趋向	(175)
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立足于史籍编纂的考察	(190)
一 最先记录佛事的史籍	(190)
二 佛教史籍门类的扩展	(200)
三 佛教史籍编纂日趋完备	(214)
如何认识和了解古代官制	(229)
一 历代官制的演变线索	(231)
二 古代官制的基本特征	(233)
三 记载官制的主要典籍	(236)

从“七史”《选举志》讨论科举制的几个问题	(239)
----------------------------	-------

关于 20 世纪前半纪史学的几个问题	(255)
--------------------------	-------

一 史学发展线索	(255)
二 “最纠纷”之古史	(264)
三 关于“历史哲学”	(274)
四 应注意的问题	(284)

20 世纪前期两次关于“国学”与

“国粹”“国故”的论辩	(289)
一 清朝末年：“国学”与“国粹”的论辩	(290)
二 民国年间：“国故”与“国学”的论辩	(297)
三 两次论辩的差异与启示	(305)

学术史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	(313)
--------------------	-------

一 缘起与经过	(313)
二 对史学的影响	(326)
三 问题与启示	(334)

唯物史观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及

面临的挑战	(340)
一 唯物史观历史学创建的艰难历程	(340)
二 唯物史观历史学基本框架的形成	(346)
三 唯物史观历史学成为主流后的基本模式	(353)
四 唯物史观历史学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355)

民国年间的几种“历史哲学”与历史观	(359)
-------------------------	-------

一 不断变换的“哲学”	(359)
二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相对论	(368)

三 “偏于‘统相’摄绎”的“文化形态观”	(377)
王国维的杰出贡献与学术影响	(389)
一 卓著的成就,杰出的贡献	(389)
二 学术思想与科学方法	(400)
三 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408)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423)
郭沫若与陈寅恪交往考	(441)
一 未谋面时存异同	(442)
二 初次交往有波折	(446)
三 “厚今薄古”生枝节	(450)
四 评赏弹词两相逢	(455)
五 李白族属起纷争	(468)
编后记	(475)

关于中国史学的基本认识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以史学的发达和文献的浩瀚著称于世。史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是反映中华文明的物质宝库。二者互为表里，拓印下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艰难步履和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辉煌足迹。

一 历史·史学·史学史

恩格斯多次论述过这样一个观点：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

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①

这段论述，非常清楚地表达出历史、史学的关系。

（一）历史，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一：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二：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三：包括人类自己的精神活动。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四：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其构成的各个细节；为了认识这些细节，不得不把它们从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来逐个地加以研究。因此，围绕历史演进的“总画面”弄清其构成的“各个细节”，便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五：不可复制、不能还原。仅有“科学的搜集与整理”，“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便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而“感情、生命、神采，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

人们对于这一过程的了解和认识是间接的，是掺杂进后人种种主观因素的。

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人类所了解的历史并不完全客观。

（二）史学，记述和研究历史演进以展示未来的学科

历史记述，受主客观条件局限，不可能完整、全面，还往往被扭曲或伪造。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417页。

不具备记述条件，往事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不知夹杂了多少口传者和听受者的主观色彩。现今一件事几经辗转相传必定走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何况古代，一传就是数十年、上百年、上千年，怎么可能保留“原汁原味”，更不要说一件事被无意曲解或有意歪曲传播了。

具备记述条件，如唐宋以下设置史馆专门搜集各项史料，形成编纂《日历》《时政记》《实录》《国史》的制度，仍然不可能记述完整、全面。一是搜集史料的制度有局限，记述范围不可能面面俱到。二是专司记录之人，居庙堂之高则不详知江湖之事，居江湖之远则更无法了解庙堂之事。三是精神活动，诸如感情、生命、神采以及融入社会生活的思想、风尚、习俗等，更非笔录、言传所能完全准确表述。四是随着史学功用的政治化、史学思想的伦理化、修史制度的程式化，修史中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政治思想决定修史的主导思想，主流思潮决定修史者的基本意识，修史制度局限史书的记述范围，以及修史者个人的“任情褒贬”“爱憎由己”。记述历史演进过程，往往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客观上造成史有佚文，特别是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二是主观上“高下在心”，或“为尊（亲）者讳”，或“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歪曲史实；三是为“利禄”“形势”驱使，编造伪书、渲染伪史。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人们所见历史记述，已不是“纯粹”的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因此需要对所见各种历史记述进行认真地研究，目的不外有二：一是弄清真相，二是进行诠释。弄清真相，分辨客观实际与主观掺杂，剔除虚假，弄清组成历史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还其本来面貌。进行诠释，是以各个不同时代的观念认识和解释历史，用以展示未来。因而，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史学，对于同一史事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弄清真相是前提，进行诠释是使命。史学就是在弄清真相与进行诠释的交织当

中不断形成一门学科的。

（三）史学史，史学的学科史

史学史作为史学的学科史，不同国家因各自的历史道路与史学遗产情况各异，便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界定。中国关于史学史的认识，基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梁启超的说法和影响，二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受苏联思想观念影响形成的一些说法和认识。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至 20 世纪 40 年代，先后正式出版的中国史学史有 10 余种，以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 1944 年版）为代表，自“创造期之史学”至“革新期之史学”，下限至“现代三四十年间”。

20 世纪 60 年代初，出现过一次关于史学史的讨论，基本是史学史学科自身的问题，诸如研究对象、任务、中国史学分期、规律等，虽然延续至 20 世纪 80 年代，却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或以史学史要“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家的历史哲学系统介绍出来”，或探索“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逐步形成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以对“史学遗产进行批评、总结”为任务，包括“史学跟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以及史学发展所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它对社会的反作用”，或将史学史研究范围确定为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虽然大都认为史学史是研究史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学科，都是在专门史层面上认识这一学科，忽略了其更本质的一面——学科史。

作为专门史，史学史同政治制度史、土地制度史、社会生活史、思想文化史等，都是以过往社会中这些领域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但史学史并不完全等同于这些专门史，还有着

同哲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中数学、化学等学科相同的一方面，是一门学科史。而上述的那些专门史，则非学科史。学科史既包括作为专门史的一方面，又包括学科自身发展的一方面，二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这是史学史作为历史学二级学科不容忽视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于史学史仅仅被当作专门史，基本沿袭 20 世纪 60 年代的这一认识：“史学史是研究人类全部历史思想的”，“是社会思想史的一部分”。以“历史理论”居研究之首，使史学史与历史理论交叉。20 世纪 80 年代，对什么是“历史理论”“史学理论”逐渐有所区分：以认识和解释过往社会（即客观历史）的理论，叫作历史理论，或广义史学理论；以关于史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叫作史学理论，或狭义史学理论。然而，在实际上仍然只谈历史理论而忽略学科自身的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进国外历史理论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这种引进基本处于介绍状态，并未见切实地运用到对中国历史实际的研究之中。只有外国历史理论的介绍，没有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研究，难免使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同行误以为史学史研究就是史学理论的介绍和检讨，这种状况几乎取代了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研究。与此同时，以现有的认识进行的史学史研究，又差不多以史学思想研究为基本内容，且有网罗“全部历史思想、社会思想”之势。这种研究，往往以相当篇幅论述、解读子部书中某些并无实际影响但被理想化了的历史认识或历史观，反而遗弃史部书中对当时乃至整个中国史学、史书编纂影响深远的历史认识或历史观。仅有思辨而无史实，既没有客观历史实际，也没有史学演进实际，不是史学，也不是史学史的研究对象。

同样，由于缺乏对史学史作为学科史的认识，将两个二级学科混在一起，以史学史研究包括历史文献学研究，造成对两个学科认识的混乱，以致两个学科的区分与联系无人问津。这使得不

少从事中国史和历史文献研究的同仁误以为史学史只是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研究，对于史书的研究只不过史学批评而已。

史学发展到 21 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及其分支学科研究，中外史学交往的研究，中国史研究与诸多专门史的关系，诸如政治制度史、军事史、法制史、经济史、宗教史、民俗史，究竟属于政治学、军事学、法学、经济学、宗教学、民俗学各个学科的分支，还是属于历史学的分支。凡此种种，既是 21 世纪史学面临的“前沿”问题，也是写 21 世纪中国史学史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自身的形成、发展、演变趋势及其深刻的内涵，在相关学科发展中的位置，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应当包括中国史学自身全方位的发展，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不仅包括中国古代史学的全方位发展，还包括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历程，也需要认真总结现当代史学的发展，既要“纵通”，又要“横通”。

具体来说，中国史学史至少应该包括下面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史家、史书、史学、史法、趋势以及制度。

史家，是史学的主体。史家的活动，特别史家的群体活动，可见其所处时代意识、普遍关注的史学问题、相互间的吸收借鉴或批驳责难，据以探知此时代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史学发展演进的总体态势。

史书，是史学成就的集中体现，综合了史家活动、思想意识、所记史事、取材范围、编纂体例、研究方法、传布影响，以及个人才识与“心术”，甚至可以窥其心路乃至某些“潜台词”的隐喻。

史学，是“史”之成学的历程，包括起源、演进、阶段划分、范围拓展、分支出现、与相关学科关系以及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形成的历史认识或历史观念的演变等。近代以来中外对于“史学”

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需要仔细区分，不可笼统地以异域“史学”概念来“界定”中国的史学。

史法，是史学得以形成、发展的方法，包括历史编纂法和历史研究法两大基本方面。史法的不断进步，推动着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没有历史编纂法和历史研究法，就没有系统的史书编纂和系统的历史研究。面对杂乱无章、零散无序的历史遗存，如自宋以来至20世纪初的上千件彝器，除了当古玩鉴赏，对于认识历史几无所用。但当两周金文辞编排成大系、“二重证据法”广泛运用后，这些历史遗存便成为认识和研究古史的必不可少的依据。

趋势，既包括各发展阶段史学演变趋势，又包括梁启超所说“最近史学的趋势”或时下所云“史学前沿”，更包括某些具体史学现象或问题的趋势，如修史思想的演变、史志编纂的因革、史学分支的发展、疑古与辨伪的同步等。

制度，主要指修史制度，这是中国史学的独特处，确保了中国历史资料积累、史书编纂的经久不衰、前后衔接。

二 如何认识中国史学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形成诸多特征与传统，但又利弊交织、错综纷杂。在系统追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之前，先对这些基本问题做一简要说明，以期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

（一）史学发展基本线索

中国史学的发展，大体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一致。一方面，史学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相应发展；另外，史学自身又有一个认识上和技术上的准备过程，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鉴于如此客观实际，在认识中国史学发展阶段时，就不能不突破历史朝代的界限，探寻出其自身发展的基本线索。

中国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历来就有不同的认识。综合多年研究所得，本书将 20 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史学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秦以前为史学形成期，汉初至唐前期为史学确立期，中唐至清中期为史学发展期，清中期以来为史学变革期。变革期，新旧、中外史学碰撞，又分三小段：增其新而不变旧（19 世纪中至 19 世纪末）、新史学兴起（20 世纪初至 20 年代末）、渐露新格局（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40 年代末）。前三个时期已成“过去时”，第四个时期尚在“进行时”。

中国史学的起源，经过漫长的岁月。殷商以前的传说时代，产生了原始的历史意识。自商代至春秋时期，经历了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的并驾齐驱和“史”向“史官”“史书”的演进。春秋后期至战国末年，自按年编纂的《春秋》问世到编年体史书《左传》诞生，标志着中国史学逐渐形成。

汉初至唐前期史学地位得到巩固确立，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其一，随着《史记》《汉书》相继出现，纪传体史书逐渐取得“独尊”的地位。在断代编年史与断代纪传史“角力争先”的进程中，史学范围第一次得到拓展，门类增加，最终使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并取得仅次于经学的巩固地位。反映社会风貌的史著与少数民族史学的瞩目成就，为此间史学成长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绚丽画卷。其二，史学的鉴戒功用经过汉初的“过秦”和东汉末的“君子有三鉴”，到唐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修史、取鉴与资治三者融为一体，取得了空前的社会效应，推动了史学的健康发展。其三，反思自身历程，《史通》的问世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终结。

中唐至清中期，是史学分支发展、古典史学终结阶段。旨在认识社会结构的《通典》与“三通”系列的形成，侧重治乱兴衰之迹的《资治通鉴》及其流变，连同已然程式化的各皇朝纪传体“正史”，构成了中国史学的三大主干。自《元和郡县图志》始，

至元、明、清修“一统志”，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总志系列，与各“正史”地理志构成中国方域史的基本骨干，展示着华夏民族“大一统”的风采。分述一方之志，自宋代开始发达起来，至明、清逐渐深入社会，省、府、州、县志的续修，成为史部分类中最大的一个门类。视野不断拓展的记域外之作，反映出中华帝国认识外部世界的艰难历程。史学方法不断进步，考异、金石、辨伪等逐渐成为史学的重要分支。各类反映社会风貌、记述专门之学的史著应运而生，更进一步扩大了史学的范围。史家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出现“以心不以迹”的说法，强调褒贬义例，逐渐形成“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的趋势，史评更趋伦理化。同时，出现另一种倾向——史学的通俗化和平民化趋势。以记述琐闻逸事为主的历史笔记大量涌现，以话说故事为主的历史小说接连问世，是史学从殿堂走向市井的必然产物。被皇家修史排斥的佛教传播史出现系列——高僧传，既为中国史学的一种奇特现象，又为世界佛教史学中的一枝独秀。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动激起“经世”思想，影响清前期的风气，一项“稽古右文”之策遏制了“经世”思想的扩展。皇家纂修史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覆盖了史部各个主要门类，显示出乾嘉时期史学的辉煌。朝廷留给读书人一条狭窄的“做学问”之路，便有了“乾嘉考史”的繁兴。不应忘记的是，乾嘉时期还有一部“不以风气为轻重”的《文史通义》，不仅对古典史学进行全面总结，更预示着其后的“思想解放”，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划时代标志。

19世纪中叶，东方古国紧闭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轰开，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从未有过的巨变，古典史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开始突破昔日的格局，跨出变革的步伐。最初60年，增其新而不变旧，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20世纪初始，出现猛烈抨击传统史学、提倡“史界革命”的新潮，兴起发掘本土文化遗存、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潮流，推动中国史学第一次发生飞

跃，迈开近代化的步履。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40 年代末，形成以两大史学主干——马克思主义史学团队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研究群体，展示出后来史学的基本走势。

（二）传统史学基本特征

作为人类文明的四大摇篮之一，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相比，为时稍晚。史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大约与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同步，而且中外各国所经历程大体一致：自有人类社会起，就产生了最初的历史意识；人们对于过往的大事，通过口耳相传，辅以象形文字帮助记忆，形成关于远古的传说；这种原始的历史观念和流传方式，便成为历史记录的前提。随后，人们渐渐能够以文字将头脑中的印象用书面形式表述出来，进而将杂乱无章的思想发展成为理性思维，出现了史著。《春秋》《左传》对中国史学固然影响巨大，但仅仅是中国史学起源阶段的最高成就，尚不足以完全代表中国的传统史学。从《史记》《汉书》起，中国史学延绵不绝，形成独具一格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在这一漫长的历程中，中国史学形成自己诸多的特征。功用趋于政治化、思想日益伦理化、史料积累制度化、皇家修史程式化、史书形式多样化，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基本表征。

1. 功用趋于政治化

史学功用，实际是治史宗旨，逐渐被单一化为政治功用。

早在商周之际，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名句出现。孔孟时代，出现所谓“春秋大义”“春秋笔法”。但以史学著作系统而完整地表达史学功用的是司马迁，这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报任少卿书》中的那段话：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